



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



田毅鹏◎著

DONGYA XINFAZHAN ZHUYI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



田毅鹏◎著

DONGYA XINFAZHAN ZHUYI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田毅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004-7895-9

I. 东… II. 田… III. 社会发展—研究—东亚 IV. D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8953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6.25

插 页 2

字 数 430千字

定 价 4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社会发展理论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 孙正聿

副主编 孙利天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丰子义	王南湜	乐国安	田毅鹏	孙正聿
孙利天	刘福森	刘少杰	宋宝安	李培林
邴 正	吴晓明	杨 耕	杨魁森	张 盾
张金荣	赵汀阳	周晓虹	贺 来	葛鲁嘉
黄冬梅	谢立中			

代序 发展的标准与选择

孙正聿

20 世纪 80 年代,吉林大学在国内率先创立了社会发展研究所,90 年代中期又组建了哲学社会学院,并在 2004 年成立了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心,对社会发展理论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发展,在其真实的意义上,是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以社会的发展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的存在方式。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既是当代人类面对的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争论最激烈的理论问题。这是因为,趋利避害的人类生存逻辑,在当代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受到了空前的严峻挑战。

发展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发展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它具有不可避免的二重性。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它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进步”,“片面性”是历史的发展形式。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舍弃。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马克思曾把市场经济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体制的意义上,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及其

原则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也就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融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而不是幸福最大化的逻辑,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对于人类来说,这个生存逻辑是对人类自身的“趋利避害”的生存逻辑的严峻挑战。马尔库塞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当代人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发展问题。

把“发展”作为最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予以研究的社会发展理论,它所面对的理论问题,首要的是对“发展”的理解和评价问题。发展,这不只是对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存在状态或存在过程的评价,因此,“发展”是以评价为逻辑前提的对存在的描述。这表明,“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对存在状态和存在进程如何评价的问题,以及依据某种评价的标准作出行为选择的问题,即在实践中作出各种顺序性安排问题。作为人类生存逻辑的趋利避害,“利”与“害”的标准如何确认,怎样的行为选择才是当代人类的真正的趋于“利”而避于“害”,怎样的顺序性安排才能使“利”大于“害”,这是当代社会发展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标准”与“选择”构成社会发展理论的至关重要的核心范畴。

“发展”的标准具有极为深刻、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它既内涵着文化的多样性,又内涵着每个时代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它既内涵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又内涵着现代化的多元选择;它既内涵着“历史的大尺度”,又内涵着“历史的小尺度”。所谓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观历史的尺度;与此相对应,所谓历史的“小尺度”,则是以人的“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规范人的历史活动的尺度。生活本身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小尺度”而仅仅承诺历史的“大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无法实现“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惨痛的是会使这个“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变形,把“大尺度”变成某种压抑个人发展的“本质主义的肆虐”;与此相反,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大尺度”而仅仅着眼于历史的“小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会失去“大尺度”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严峻的是使这个“小尺度”所规范的历史活动危及人自身的存在,从而使人们在这种“小尺度”中感受到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关于“发展”的根本标准。这个“标准”作为“历史的大尺度”与“历史的小尺度”的“微妙的平衡”,构成了我们的行为选择的出发点。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这个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社会发展的三大问题:一是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致力于解决公共利益最大化、满足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的民生问题;二是致力于解决资源环境体系的压力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致力于解决公共治理结构中的政府自身建设问题,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下的行为选择,也就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对现代性的行为选择。

作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在充分汲取国外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我感到,解放思想,首先需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气魄。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需要我们以宏伟的气魄和开阔的视野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解放思想,还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凛然正气。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地凸显出来,它要求理论工作者以直面现实的凛然正气去研究这些深层次矛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回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有了这种凛然正气,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提出和探索新问题。解放思想,还需要有创新的理论勇气。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解放思想并不只是一个口号,它要求我们:一是要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而不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作出某种简单化的判断和评说;二是要从唯上唯书、人云亦云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我们面对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出发,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三是要从僵死枯燥、言之无物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凝练新的思想和新的语言,作出新的论证和新的阐释。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它的关切点总是自己时代的最为重大的现实问题。人类的趋利避害的生存逻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并构成我们时代的诸多的重大课题，引发了我们的共同的关切与期待。愿本丛书的出版能够切实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

目 录

代序 发展的标准与选择	孙正聿(1)
导言	(1)

第一部分 “新发展主义”与发展研究的转向

第一章 “新发展主义”的勃兴	(31)
一 “新发展主义”的内涵	(31)
二 “新发展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34)
三 “新发展主义”的理论载体及其主张	(44)
四 “新发展主义”与发展理论的重建	(69)
第二章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	(72)
一 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的发轫	(72)
二 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转向”	(75)
三 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78)
四 从“城市—农村”的社会学到“地域社会学”	(82)
五 地域社会学的研究主题	(87)
第三章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研究的转向	(92)
一 东亚文化自觉思潮概观	(93)
二 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	(103)
三 “非西方化”的研究取向	(111)

第二部分 传统与变迁

第四章 东亚文明的“传统”与“现代”	(121)
一 文明的“空间分布”与研究单位	(122)

二	文明结构：“中心”与“边缘”	(125)
三	寻求“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	(128)
四	文明研究视野下“亚洲主义”之论争	(133)
五	东亚文化认同与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	(136)
第五章	空间知识变动与东亚现代化的起源	(149)
一	问题的提出	(150)
二	东亚传统“空间观念”的特质	(157)
三	西学东渐与东亚国家“空间知识”的变动	(160)
四	结论	(170)
第六章	区域文化与东亚社会发展模式选择	
	——以中国东北区域为研究个案	(172)
一	“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	(172)
二	东北地域文化特质与社会发展	(175)
三	几点思考	(185)

第三部分 东亚发展危机与社会分化研究

第七章	东亚社会的“危机”与“发展”	(191)
一	东亚社会发展进程中“危机论”的特殊含义	(191)
二	东亚“危机”与“发展”的复杂关联	(194)
三	对东亚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	(199)
四	关于危机对策的思考	(204)
五	东亚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	(207)
第八章	东亚社会分化研究	(213)
一	“新发展主义”的“弱势群体”观	(213)
二	日本的“格差社会”论	(219)
三	东亚社会分化之比较分析及对策	(229)

第四部分 东亚社会建设的新取向

第九章	东亚社会建设与新公共性构建	(241)
一	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	(241)

二 东亚“公共性”的一般特质	(250)
三 东亚的“新公共性”及其表现形态	(253)
四 东亚“新公共性”构建的限制	(259)
第十章 中国“家文化”与社会工作本土化	(264)
一 中西社会结构之“异”	(264)
二 社会结构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制约	(268)
三 转型期中国社工理念的创造性转化	(269)
第十一章 东亚社区发展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	(275)
一 东亚社区发展的社会背景	(276)
二 日本町内会与社区发展	(278)
三 地域发展进程中的“地域对立”——以韩国为例	(283)
四 社会转型期传统体制对社区发展的制约 ——以中国长春市为研究个案	(287)
 第五部分 东亚地域发展模式批判	
第十二章 东亚城市过密问题及其对策	
——以东京为例	(312)
一 “过密问题”的起源与发展	(312)
二 过密现象之成因分析及表现形态	(316)
三 过密问题及其对策演进	(321)
第十三章 东亚乡村衰落与地域协调发展	
——以战后日本“过疏对策”为例	(329)
一 乡村“过疏化”与城乡空间关系重构	(330)
二 过疏对策的演进及其限制	(332)
三 乡村“过疏化”进程中衍生的老人问题	(338)
四 地域协调发展理论的建构及启示	(344)
第十四章 流动的现代性:东亚“轿车文明”批判	(347)
一 “轿车文明”的根性	(347)
二 轿车文明与都市“空间生产”	(350)

三 为轿车社会做准备	(360)
 第六部分 全球化、民族国家与东亚集体认同的重构	
第十五章 全球化、民族国家与东亚共同体构建	(365)
一 国家社会学、全球社会学、国际社会学： 研究视角的演变	(365)
二 “东亚”、“东亚共同体”概念之研究辨析	(366)
三 全球化浪潮对东亚的挑战	(369)
四 “民族国家认同”与东亚区域空间之分裂	(372)
五 寻找推进“区域认同”的软力量	(374)
六 以欧盟为镜	(376)
第十六章 东亚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	
——以转型期中国单位制度变迁为例	(380)
一 问题的提出	(380)
二 工业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与单位制度之构建	(381)
三 单位制度变迁背景下“集体认同”问题之发生	(384)
四 单位制度变迁背景下“集体认同”重构之限制	(388)
结语	(393)
参考文献	(398)
后记	(407)

导 言

一 问题之缘起

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伴随着人类文明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和世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勃兴的社会发展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与战后“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社会发展研究不同，此次研究浪潮是建立在对发展主义反思的基础之上，试图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带有“新发展主义”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社会发展理论因革嬗变的轨迹看，如果说战后社会发展是在“发展主义”主导下展开的，其核心主题是后发国家赶超式的经济发展，那么，20世纪晚期勃兴的社会发展模式研究则带有明显的“新发展主义”色彩。在反思批判“发展主义”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追问：“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的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①由此，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成为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的新主题。

第二，与战后社会发展模式研究重点以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②，近年来的社会发展模式研究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而且包

① 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 虽然关于战后发展研究的理论界定，存在诸多理论流派，但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将非西方国家作为发展研究的最主要对象。如在亚当·卡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即对“发展”词条做如下介绍：“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组，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分析和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人民所说的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以这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这类学科包括经济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而且，越来越多的技术学科也渐渐地加入进来。”

括西方发达国家和改革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三条线索并行的新格局。而如东亚、欧洲那样的地区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尤其成为研究的重点。

第三，与“发展主义”主导下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的乐观自信相比，新发展主义所阐发的理论体系中，充斥着“危机”、“风险”等词汇，整个世界深深地陷入一种“不确定性”和“末世感”中，而且这种“危机”是直接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深深的忧思。“如果发生了发展的危机，那么这一危机所产生的第一个效果，和其他危机中一样，就是使本来已经确定的东西变得不确定，使本来已经清晰的东西变得混乱，而且使本来显得协调的概念内部产生了矛盾。导致发展这一概念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神话的、贫乏的”^①。

第四，与战后西方理论主导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进程和演进趋向不同，非西方国家在实现“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开始努力将自身的社会发展植根于本土，形成了一些具有民族文化自主性的社会发展理论流派。毫无疑问，这使得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模式的“自我选择”能力空前提高。

本书的研究即是在上述背景下，试图对20世纪晚期以来在新发展主义主导下，国内外学术界在东亚社会发展模式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新趋向进行总体研究。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乔万尼·阿里吉、马克·赛尔登和日本史学家滨下武志在论及东亚社会发展模式及其所面临挑战的问题时，曾特别强调东亚社会发展研究的特殊意义，他们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了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作为世界两大军事霸主之一的解体，以及东亚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力量中心之一的崛起。”^② 这既充分肯定了东亚复兴的世界意义，同时也强调了东亚发展研究的特殊价值。一些研究者大胆打破传统研究模式的束缚，从新的研究视角出发，陆续推出了一些分量厚重的研究成果，表现出宏大的研究视野和全新的比较研究价值取

① [法] 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页。

② [美] 乔万尼·阿里吉、[日] 滨下武志、[美] 马克·赛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向,使东亚社会发展研究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发展趋向。

检视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学界关于东亚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颇具影响的代表作,如(1)历史社会学和比较现代化研究者的解释:主要以中国学者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陈峰君的《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等著作作为代表。此外,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日裔学者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成功?》、《日本为什么衰落?》等著作中,以日本为个案,对东亚奇迹亦有独到的解释。而日本著名汉学家沟口雄三等知名学者主编的多卷本的《从亚洲思考》和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赛尔登跨国写作班子合著的《东亚的复兴——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为视角》则又开辟了“亚洲视角”和“时段转换分析”等理解东亚社会变迁的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2)发展经济学的解释: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一直将东亚研究作为其学科研究的重点,从而成为东亚研究最有力的推动者。从 1993 年开始,世界银行连续发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1993 年)、《东亚的经验教训:各国情况纵览》(1993 年)、《东亚的复苏与超越》(2001 年)等关于东亚奇迹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东亚奇迹”、“东亚模式”等概念,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此外,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也都试图通过对东亚奇迹的研究来构建其学科理论分析框架,涌现出一批颇具影响的代表作,如弗里德里克·C. 戴约的《东亚模式的启示》、霍夫亨兹的《东亚之峰》、加里·杰里菲和唐纳德·怀曼的《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沙希德·尤素福和西蒙·伊夫耐特的《东亚具有竞争力吗?应对全球市场竞争的创新法则》、克莱森斯和格莱森纳的《金融部门的软弱性是否损害了东亚奇迹》、克鲁格曼的《流行的国际主义》、长谷川启之的《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青木昌彦的《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村哲的《论东亚经济的现代化》、陈岩的《东亚再崛起》、江时学的《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李晓的《东亚奇迹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黄卫平的《亚太经济中的龙:要素、结构、环境与比较》、张捷的《奇迹与危机:东亚工业化的结构转型与制度变迁》等,都对东亚奇迹给

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解释。

(3) 社会学的解释：社会学家对东亚社会发展的研究，初期是围绕着“韦伯命题”进行，后来则主要针对发展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理论流派的观点展开。在回应“韦伯命题”的过程中，产生了如美国学者贝拉的《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杜恂诚的《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的中国的宗教》等著作，其研究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亚洲资本主义是不是也有其文化的根基，尤其是宗教和伦理根源？假如是的话，它们又是什么呢？”^①而世界体系论的鼻祖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则运用其“世界体系理论”对东亚奇迹给出一些独到的解释，其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东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还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②。此外还有中国学者李文的《东亚社会变革》、李培林的《重新崛起的日本》等著作。

(4) 文化学、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在东亚奇迹的理论解释体系中，文化学是一极为重要的研究视角，无论是探寻东亚奇迹的深层精神动力，还是反思东亚发展危机的内在缘由，似乎都离不开对东亚世界的文化理解和分析。早在东亚奇迹初现之时，便有众多学者醉心于所谓文化解释的分析路径，试图发现东亚奇迹背后的精神动力。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狄百瑞的《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吕元礼的《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夏光的《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等著作。而当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深陷危机之中时，对东亚持反思批判的观点同样选择了文化分析的路径。如当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教授虽以经济分析见长，但却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等著作中，以其独特的亚裔身份，运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独特的发展观”，对“亚洲价值观”与“东亚奇迹”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了犀利而系统的辩驳。同样，那些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审视东亚现象的著作，也多是围绕“威权主义”与“东亚奇迹”间复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页。

^②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11页。

杂的互动关系展开分析的。

上述论著的特点在于，其比较研究的单位不再仅仅是“国家”，而往往是“地区”，或者是关于某个地区内部各国间现代化要素、结构、环境的比较；或者是两个地区间的现代化比较。有的研究者还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概括性研究命题，如美日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赛尔登合作提出的“东亚复兴论”、罗荣渠关于东亚由传统到现代转型过渡的“三类型说”、日本学者富永健一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四命题说”、小林多加二的从“国富”主导型到“民富”主导型转变的东亚转型现代化的新范式、韩国学者韩相震的东亚“第三条道路”、白永瑞的“知性的东亚”等观点。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子安宣邦，韩国学者白永瑞、韩相震，中国学者孙歌、葛兆光等，对东亚概念所作的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深刻反思，亦产生了重大影响。上述研究都极大地拓展了东亚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研究的范围，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标志着学术界有关东亚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持续高涨的热点。

但迄今为止的东亚研究仍有值得进一步深化之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迄今的东亚社会发展研究，其学术话语主要由“发展经济学”把持，前文所列举的东亚研究的著名学者，绝大多数都是资深的经济学家，其研究虽然也涉及狭义的东亚社会发展，但其所关注的“社会发展”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即以“经济发展”替代和覆盖了全方位的社会发展。在“经济发展”话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虽然学术界的东亚社会发展研究有时也大谈“思想文化”、“威权政治”和“社会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和“威权政治”实际上是从属于“经济话语”的，充其量不过是经济话语的“解释”和“补充”而已。至于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而言的、狭义的“社会发展”，事实上已被置于边缘地位，很少被提及。如果说在战后初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东亚各国在回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过程中，为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改变经济落后局面、实现自己的“赶超式发展”而采取“发展主义”的发展方略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新发展主义”渐成社会主体发展思潮的背景下，我